

以色列间谍大师

(美) 斯图尔特·史蒂文著

浦 洱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以色列间谍大师

〔美〕斯图尔特·史蒂文 著

浦 洱 译

一九八六年·北京

以色列间谍大师

〔美〕斯图尔特·史蒂文 著

浦 洱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297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44 定价：2.60元

（内部发行）

內 容 提 要

以色列情报机构是世界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本书以真实的史料记叙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全部历史和谍报活动。材料翔实，文字生动，对我们了解以色列情报机构有一定助益。由于作者的立场所限，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希读者加以鉴别。

前 言

约翰·勒卡雷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说，特工机关是一个国家潜在意识的唯一真实写照。这是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反复回味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从一个情报人员的角度来看，情报机关的历史应该就是它所为之效劳的那个国家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们用不着看完勒卡雷的全书就能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秘密，即他们内部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对外是如何待人接物的，常常能比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所摆的架势更准确地反映此类人的为人，当然，也就显得更有意思。从没有一本关于情报机构的书可望能道出其中全部内情，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永远不想向外透露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只要说说下述情况就足够了。为了把这本书写成一个了解内情的人的著作，而不是什么官方钦定的作品，我曾接触了以色列情报机构内地位相当高的人物。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以色列作家能被允许如此接近这些人，也没有一个能接触这些高级人物的以色列作家会被允许根据采访获得的材料来写作。

为使本书不致过长，我几乎没有触及内部安全保卫和反间谍的情况，而是把笔墨集中在以色列海外情报活动的两个最重要方面：军事情报活动和政治、非军事情报活动。

各个国家都有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两个系统。通常情况

下，政治情报居于首位。例如，在苏联，克格勃无论是在声望还是在权力方面，都高于苏军情报局。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比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重要得多。

在以色列，正如本书所要揭示的那样，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内部斗争中，政治情报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总是交替得势，这种斗争从未得到圆满解决。我所描述的这种斗争，以及情报机构所做的工作，便是本书的一个主要题目。以色列从来就没有处理好过政治领导集团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历史最能说明问题。

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我不能在此提及许多人的姓名，即使我想这样做也不行。被派到赫兹利亚的旅馆来见我的人，只报其名（就连这点也可能是假的），而我之所以相信他们，仅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谁派来的。另外一些人，则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旦透露他们的姓名，重者会危及他们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轻者也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在我采访过的人中间，可以透露姓名的人包括：外交部政治司前司长鲍里斯·古里埃尔；情报机关早期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杰出外交官的亚伯拉罕·基德隆；以色列情报机关创始人之一埃胡德·阿夫里尔；摩萨德的前局长伊塞尔·哈雷尔；摩萨德和军事情报局前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军事情报局前局长耶霍沙法特·哈卡比将军；军事情报局前局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五、六十年代活动在埃及的以色列特工人员沃尔夫冈·洛茨；五十年代活动在伊拉克的以色列特工人员耶胡达·塔贾尔；当代以色列情报的神圣奠基人肖尔·阿维古尔；因参与所谓“拉冯事件”而被监禁的埃及犹太人维克托·莱维及其小组的成员；

杰出的摩萨德前副局长雅科夫·卡罗兹，以及军事情报局局长长阿哈隆·亚里夫的前助手阿鲁夫·哈雷文。我总共进行了一百多次采访，绝大部分都录了音。事实上，我同每一个自以色列国建立以来在政治或军事情报方面有影响的人物都进行了交谈。

我要特别感谢摩萨德当时驻西欧的高级官员“亚伯拉罕”和他的顶头上司“戴维”，没有他们为我积极活动，我就不可能在以色列立足。“亚伯拉罕”已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他的为人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一个人干的勾当有时肯定不十分光彩，但他仍然可能是个极端正直、始终富有人性和讲究人道的人。

我还应当感谢协助我在以色列调查情况的人。埃坦·哈伯是以色列最有声望的军事评论员之一，又是《新消息报》的军事记者，他独自或与别人合作写了许多本书，其中包括一部关于以色列袭击恩德培的最好、最有权威的著作《营救恩德培人质》。埃坦·哈伯不断向我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不然我是搞不到这些材料的。

我还得感谢佩尼娜·佩里夫人和乔·摩根斯坦先生，他们为我把大量材料从希伯来文译成了英文；感谢希瑟·戴尔夫人，她一遍又一遍地为我的手稿打字，并整理了大量的采访录音。我还要对帕特·托尔斯表示感谢，他是如此出色地编纂了我最后的手稿。

我要赞扬一下我的夫人英卡，她不仅同我一样为这本书操心，而且还为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她参与了我大部分的采访，并为我出了很多主意，想了很多办法。亚伯拉罕曾为我们请来一个人帮忙。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个请来帮忙的人

说：“我应付他不成问题，但我竟没意识到她是那么聪明，等我明白了这一点，已为时过晚了。”我还须感谢乔治·格林菲尔德。据我看，他正是世界上那种最好的，也是最乐意帮助人的出版界代理人。他提出了本书的主题并使我在形势十分糟糕的时候，没有搁笔。

序 言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疑虑重重的世界面前，对着电视摄影机镜头互相拥抱，以显示戴维营最高级会议的成功结局。这时，埃及总统用埃及人特有的充满辛辣、幽默色彩的宿命论语气对贝京说：“现在，你至少可来参加我的葬礼了！”贝京没头没脑地答道：“不会有葬礼了！”听到这番对话的人中只有很少几个理解其中的含义。

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两个按着锦囊妙计干了一番秘密勾当的同谋，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相互对视着。事实上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来之不易的辉煌的外交胜利，而且还达成了在那永远使人着迷、常常搅扰人心、有时令人发指地偏执的秘密情报界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一项协议。

这项协议包含在公开发表之协议文本的秘密附录里，对于以色列的情报界来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以色列情报人员总是单枪匹马地同阿拉伯各国情报机关、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俄国克格勃的联合力量进行战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萨达特尊重以色列秘密情报机关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哈卡·霍菲将军，一位性格强悍、阅历丰富的前坦克兵司令、以色列“中央情报局”（即众所周知的摩萨

德)局长,曾去见以色列新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当时,贝京执政还不到一个月,他所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是在一次举世轰动的大选中最后击败当政三十年之久的以色列工党的。霍菲给贝京带来一份很值得注意的详细文件,内容是利比亚主席卡扎菲上校制订的将利用巴勒斯坦刺客谋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一项行动计划。

这份情报来自霍菲及其杰出的前任安插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的特务——这些男女特务埋藏得很深,数年来一直在为以色列人出谋划策,使其多次挫败那支世界上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指挥最精和训练有素的恐怖主义的军队。摩萨德撒下的大网捕捉到了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并无多大关系的鱼,这当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色列人不会无端地喜欢起萨达特来,也不会对他的遭遇过于关心。萨达特一直率领他的军队同以色列人作战,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犹太国的死敌。尽管如此,霍菲还是建议按照以色列政府过去在同样情况下的作法,把这份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由他们作为一项美国情报转给埃及总统,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能有利可图就行。但贝京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要让埃及人知道,我们同他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要把这份情报转送给萨达特总统,并致以以色列政府的问候。二十四小时之内,哈卡·霍菲就登上了前往摩洛哥拉巴特的征途,去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碰头会——在情报人员的秘密世界里,这类的碰头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根据事先的约定,他准备会见埃及情报机关负责人卡迈勒·阿里。不管埃及人是怎样怀疑以色列的动机,他们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以色列的情报太具体,太详细了,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样做是

正确的。他们按照摩萨德提供的在开罗的一些地址于拂晓时分展开了一系列袭击，逮捕了卡扎菲上校的阴谋分子。关押几天之后，卡扎菲雇佣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就都招认了，还交出了隐藏的武器和文件。文件证明他们是受卡扎菲主席指使的。萨达特立即作出反应：为了惩罚卡扎菲，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边界袭击，打进了利比亚领土；为了感谢以色列人，他终于向以色列人透露，他多年来一直怀有一种心愿，即相信他能够同他的宿敌签订一项休战条约，为这个多事地区带来和平。于是，这样一项情报活动就使萨达特总统实现了他带有历史使命的特拉维夫之行。而且，也正是这些秘密情报活动，又促使我们走上了通往戴维营的道路，并把这一势头保持至今而不颓败。也许，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归宿。

过去三十五年中，还没有哪个地方象战争一触即发的中东地区那样，下那么大的本钱来搞秘密情报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彼此争斗是为了维护各自国家的声誉，而以色列和阿拉伯情报机关之间的交战，则是为了它们各方的生存。

自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冲突以来，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包括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期间的消耗战）和多次流血的军事冲突，但对双方的情报机关来说，这些战争只是在一个更大和更公开的舞台上，以一种慈悲为怀、简洁明了的方式再现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那种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任何一方都从来不会忘却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士兵可以回到兵营暂时休整，敌对情绪却永远不会消失。

这些情报机构均为战时编制，其不共戴天的情绪，其残

酷无情的手段，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情报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方利用情报机构进行了一场大搞阴谋诡计的激战。在这场激战中，阴谋不断地被策划出来，又不断地被挫败，其错综复杂的情况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在任何方面，都堪与传奇文学和情节剧的那些荒诞不经的情节相媲美。”

“我们要善于完成我们的任务，”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新手被告知，“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

戴维营协议对今后如何进行这场情报战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重大意义。因为，令人简直不能置信的是，按双方签署的秘密协议，这个地区两个最强大的情报机关——埃及情报局和以色列秘密政治情报机构摩萨德——将互通情报。这样，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然，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象以色列的军队一样，在这个地区一直处于优势。由于人不多、经费很少，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只能守住阵地，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比人数众多而政治上分裂的对手略占优势。但是现在，由于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携手合作，就给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当头一棒，使其力量削弱到令人惊讶的程度。简言之，以色列赢得了一次最大的胜利。

巴勒斯坦领导人听到戴维营协议的消息后，发誓要进行报复。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后来对他的同事所说的那样，他被列入了那样多的暗杀名单中，以致这些名单都够用来裱糊他的整个起居室了。以色列则成了那冷酷残忍的恐怖运动的目标。埃及和以色列驻外使馆和航空公司也将要为他们两国

领导人的愚蠢行动大吃苦头。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员相信萨达特能活很久。以色列自己也捏了一把汗。

但是令人惊奇和难以置信的是，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巴勒斯坦恐怖活动一直处于低潮，并且比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六十年代初第一次成为一个实体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恰似阿拉伯神话中的魔鬼又被装回了瓶子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帮助巴勒斯坦人在一九五五年建立起一个结构紧密的军事组织的是纳赛尔总统。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一开始并无多大作为，只是到后来纳赛尔拟定了一项政策，用巴勒斯坦的敢死队来代替他同以色列人打仗时起它才发挥了作用。纳赛尔把他们武装起来，对他们进行训练，为他们出钱，并为他们配备了埃及军官。

当然，在以后的几年里，巴勒斯坦人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一直在找寻和发现新的保护人，为的是不要只受惠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势力。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俄国人对于他们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巴勒斯坦人总还得求助于埃及人，尤其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在阿拉伯各国中，埃及是最稳定的国家；它的情报机关不仅是最大和最专业化的，而且受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最少，同时还拥有一批靠工作能力，而不是靠恩赐任职的专业人员。

现在巴勒斯坦人和埃及人之间的那些联系被突然损害了，这对以色列的情报界来说是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收获，只是因为当时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即埃及人知道，如果没有摩萨德和埃及情报局之间的友好条约，在戴维营所取得的一切就必然会落空。能够保证埃

及总统生命安全的是摩萨德；能够监视阿拉伯抵抗阵线国家的活动的是摩萨德；在埃及人协助下，将大大削弱巴勒斯坦人那个拥有战斗力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还是摩萨德。

尽管巴勒斯坦人到如今才开始估计到以色列——埃及协议的真正重要意义，这项协议却给他们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甚至比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在约旦内战中遭到的灾难还要严重。这两场内战使巴勒斯坦人在那里的全部基地丧失殆尽，也导致巴勒斯坦人在一九七五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中蒙受巨大损失。如果我们用玩世不恭的话来说，那么，在这两次大灾难中，巴勒斯坦人只是死了一些战士，而随着新的一代人的成长，这些死去战士的位置是很快就能补上的。但是，以色列——埃及秘密情报协议却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战斗力。

埃及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是埃及人扶植起来的。当然，以色列人多年来也成功地打进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许多部门。然而现在，在埃及的合作下，巴勒斯坦人具有的严重威胁已被排除。

事态的这些发展在巴勒斯坦人内部引起了反响，一种自相残杀的仇恨顿时表现出来，而这种仇恨，只有同戴维营协议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在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声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贝鲁特总部受到了敌人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因而它已不再能发挥领导作用以成功地进行一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战斗。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两名叛徒——以巴格达为基地从事活动的阿布·尼达尔（还被称作萨布里·哈利勒·巴纳或马

赞、萨布里、巴纳)和来自南也门的瓦迪·哈达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们在巴黎、伦敦和其它地方袭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企图杀出一条血路，从而成为激进的巴勒斯坦舆论中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正统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确实遭到了难以容忍的渗透，然而这些叛徒集团本身也同样难免这种遭遇。没用多久，以色列人就摸清了他们的情况，于是就在埃及人的有效帮助下，借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之手，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集团及其支持者搞得几乎到了威信完全扫地的地步。

在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格达，各种不同的巴勒斯坦组织常常为一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有时有人因此而丧生。这些争吵往往是不对外声张的，但这些致命的争端却全部受到幕后操纵者摩萨德的监控，有时甚至还受到它的挑动。

以色列人当时对巴勒斯坦人的卓有成效的控制就对美国那样遥远的国家都有所影响，而且还直接导致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的辞职。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安德鲁·扬到科威特驻联合国大使阿卜杜拉·比沙里的官邸，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的官方观察员泽赫迪·特尔齐进行了谈话。这次会见是违反卡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关于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官员不会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协议的。

最初，当消息第一次传出时，有人还不免说特尔齐是偶然到比沙里那里去串门，而安德鲁·扬恰好正在他这位科威特的同事家里。事实表明，正如以色列人很快就毫不留情地证明的那样，这种说法不怎么合乎情理。以色列人向所有的人表明，他们清楚地知道，会晤中谈到什么，会晤是怎样安

排的。他们看来甚至还掌握了双方谈话的部分记录。

很自然，美国新闻界和联合国的反应变得十分强烈起来，甚至到了胡乱猜测的地步。人们关于以色列人对科威特大使进行窃听的武断说法，在美国报纸的报道中都成了“事实”。包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内的所有联合国高级官员都开始对以色列人到处都有“耳朵”的说法信以为真了。

对这种狂怒情绪以色列则暗暗高兴，因为说他们无所不知，这肯定不会给他们的情报机关带来什么害处。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情报工作的成功，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成功：可以用其成就劝说特务倒戈；可以因对方产生的恐惧阻止其轻举妄动；可以使潜在的朋友同意结盟，因为谁都希望同胜利者在一起。

但是，安德鲁·扬事件背后的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神秘。科威特大使在这次会晤的当晚向本国外交部发了一份长长的外交电报，尽可能准确详细地介绍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并且说明了这一会晤的背景。科威特人自然会向已遭到渗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这份电报的内容。于是，几小时之内，电报内容就被特拉维夫摩萨德知道了。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对科威特大使进行窃听，也不需要任何人破译科威特大使的外交密码，就在科威特政府决定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报情况的时刻，这份电报就已无安全可言了。

如今，以色列的情报界在中东独占鳌头，不重视它的声音，就会承担风险。例如，在伊朗国王倒台前几个月，以色列人就曾提请美国人注意，如果不去全力支持巴列维，他们将会促成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美国国务院对此则置之不理，认为所听到的只是对好斗的伊斯兰教感到害怕的犹太国

的一种特别恳求。此外，以色列人还通过中间人向沙特阿拉伯人预先通报了就要发生的对麦加大清真寺的袭击一事，结果也被置若罔闻。以色列人在这一他们寻求生存却不得安宁的地区，还从未能象现在这样施展他们的影响。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事实上，以色列情报组织同任何一个情报组织一样，它的历史也不是一部全胜的历史。它受过创伤，甚至濒于绝望的境地。在它取得许多胜利的同时，也遭到过几次重大的失败。如果说今天以色列可以进行一项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情报活动的话，那是因为实践证明它业已有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

特拉维夫中央情报学校的一位教员对他的学生们说：“在你们之前干这种工作的有很多人。现在，你们的责任是保证今后将有更多的人踏着你们的足迹前进。花几十年建立起一套传统，时间不算长。好好学吧！”

普通的以色列人说，这套传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圣经上叙述的年代，当时摩西派出十二个人去“……侦察迦南乐土……看一看那块土地……看一看在那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是强盛还是软弱，是稀少还是众多？”他们说，从那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勒斯坦为英国人效劳的一个杰出的犹太间谍机构，再到今天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活动，始终贯穿着这么一条线。

但是真正从事这一间谍活动的行家，对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凭空设想，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说，他们那些传奇式的英雄业绩，是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不久才开始的。正是在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他们才正式登场，开始了他们的活动史。当然，本书也就从这儿开始写起。